

SHENXIANGSHIJIE REDIAN DESHOU

【美】 田·伍德沃德 著

江 南 张雨森等译

SHENXIANGSHIJIE REDIAN DESHOU

伸向世界热点的手

（幕——中央情报局秘密战——）



南京大学出版社



伸向世界热点的手

[美] B.伍德沃德 著
袁培国 张 帆 等译
郑振东 校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南京

(苏)新登字第011号

伸向世界热点的手

〔美〕B.伍德沃德 著
袁培国 张 帆 等
郑振东 校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字数480千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305-01277-7/G·236
定价：6.50元

序

多年来，神秘莫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是文人墨客喜欢涉足的题材。此类作品可谓浩若烟海，国内译本亦比比皆是，然而，大多系供消遣的通俗之作，内容不外乎众所周知的那些打打杀杀、斗斗、谋杀、策反、美人计之类的俗套，且充塞着许多作者臆想的成份，使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更添几多玄乎又玄的色彩，但却掩盖了许多真实。相比之下，《伸向世界热点的手》（原作书名为《幕——中央情报局秘密战》）一书，可谓是不落前人窠臼的严肃之作。

首先，我们应当特别指明，该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部不含虚构成份的纪实性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置于美国政府、国会等上层决策层的背景之下。作者着力于揭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在美国政府的操纵下如何打着冠冕堂皇的招牌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干着不可告人的间谍·情报·颠覆活动；如何借这类卑鄙的手段达到国防部的武力和国务院的外交活动所难以奏效的目的。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具体的情报活动场面。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被揭去面纱的美国政府及中央情报局在国际事务中的真实面目。美国一家报刊对该书所作的一段评论，确是精辟之言：这部作品“颇似剥去钟表的外壳，窥视它的机械装置。这个机械装置便是美国政府的最高层。”

对美国最高决策层内幕的揭露之深刻是前所未有的，这是该书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作者以中央情报局的据动作为一条主线，首次如此全面·深刻·真实地将白宫·国会·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之间的磨擦、龃龉、争斗、苟合，披露于世人面前。在这些鲜为

人知的内幕面前，美国政府历来标榜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实在令人瞠目。正如美国《新闻日刊》评论的那样：这部作品“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华盛顿最高层机构之间尔虞我诈、两面三刀的肮脏手腕是如何无奇不有、不可计数，真如同海外间谍活动伎俩一般五花八门”。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利益”是白宫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依据，而所谓“美国的利益”，则只是美国少数当权的大资本家的利益。为此，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除去有碍于他们的侵略主义政策实施的障碍；他们可以阻止智利的阿连德上台执政，也可以迫使他们的同路人——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英曼卸甲从商。

内容的翔实、丰富，是该书的另一大特色。书中涉及的各类人物，皆系确有其人；所述之事，均有出处。作者先后同250余名情报界人士和情报使用者会晤，其中多次会谈者达100余人；与15名关键人物面谈达63次以上。这些人物包括中央情报局上层人物、国会参议院各委员会议员、白宫高级工作人员，以及从事具体工作的下层雇员，仅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的面谈和电话通话，就达48次以上。作者还利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政府文件、备忘录、笔记、各类日程表、大事记年表、信函、手稿及日记，从而使这部“难得的、具有史料意义的作品”更为真实、可信。

场面之宏阔是该书的第三大特色。作者以编年史手法全面揭示了里根政府在1981—1987年间借中央情报局之手干涉别国内政，尤其是实施这类对外政策的决策内幕，历数美国在世界各地充当国际宪兵、到处插手的不光彩的行径；从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到中东的黎巴嫩；从非洲的利比亚，到欧洲的波兰，中央情报局的魔影无所不在。他们的黑手不仅伸向他们的宿敌——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染指于他们“盟友”的内政。在手段上，亦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天上的卫星、飞机，海上潜艇、海底的通讯电缆窃听装置，等等。招募的谍报人员也是应

有尽有：上至波兰总参谋部高级军官、苏军情报部门高级工作人员，下至各类普通工作人员，乃至使馆女佣。在这里，美国中央情报局那好似章鱼般伸向世界所有热点的不可计数的魔爪，被暴露得异常分明。正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价的那样：

“这部作品对美国间谍活动所作的丰富、翔实的描述，是前所未有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该书确系一部格调严肃、内容丰富翔实、场面宏阔的力作，非大家手笔而不可为之。而作者确实就是这样的大家。B·伍德沃德是《华盛顿邮报》负责探隐记者工作（专事揭露政界腐败及不道德行为）的管理编辑，轰动一时的水门丑闻的揭露报道者。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占有大量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历时四个寒暑，终于创作这部惊动美国朝野的力作。美国《商业周刊》载文评价该书“是对美国政府、历史及情报界内容感兴趣的人值得一读的一部引人入胜之作。”就连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B·R·英曼本人亦深有感慨地承认：“我应向伍德沃德致敬。他是当今之世我们所见到的伟大探隐记者之一。”正是由于这些原故，此书一经问世，便膺获“1987年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之首”和“本世纪间谍小说之魁”的桂冠。

该书对深刻、全面了解美国政治、对外政策实质、美国政府高层决策内幕，特别是美国的“第五纵队”——中央情报局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将大有裨益。

参加本书翻译人员：瘦红（序幕—3章）、陈道蓄（4—7章）、袁培国（8—11章）、江南（12—15章）、郑振东（16—18章）、张帆（19—21章）、李光忠（22—25章）。

袁培国

1990.11.28

序 幕

闹钟唤醒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军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他讨厌早起，闹钟按到了早晨7时，这已是不能再迟的时限。今天是1980年11月20日，星期四。伊朗人质危机已经到了第383天。52名美国人被扣押在德黑兰，此事导致吉米·卡特于这个月初在总统竞选中失利。过一会儿，特纳将向新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汇报情报工作。

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联邦调查局发现一些伊朗人在华盛顿市郊使用远程步枪练习射击，于是连续好几个星期在特纳住宅的底层安排了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警卫人员。不过现在警卫已撤去，住宅又恢复了宁静。

海军退役四星上将特纳，今年56岁，正处壮年时期。他是系统分析家，海军的“思想家”，曾获罗德施奖学金，在牛津大学从事过研究工作。他总是试图超越眼下注意更大的问题。可他又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此时此刻，他正夹在两个上司之间，在此权力更替之时，各种矛盾的感情拉扯着他。

首先，特纳必须看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把那些真正的秘密介绍给里根。这些秘密是指新总统必须知道的潜在的爆炸性与危险性的行动以及间谍技术。这是桶底之物，不曾泄露给新闻界，也不曾被苏联谍报人员探知。在里根确定他将委之以此任的人员之前，特纳只能在仅有他和里根两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面对面地向里根汇报。在前两次汇报时总有些帮闲的政客出现，今天他们也很可能到场，在他们面前特纳不能泄露。特纳最终必须向当选总统说明的最机密的情报行动之一就关系到100多人的生命安全。

特纳还需要引导里根注意这些事件所涉及到的更加深入的哲学问题——间谍与隐密活动的机会与危害，这是总统必须做出真正选择之所在。里根曾许诺要使之恢复元气。

特纳希望自己对里根的看法能有所改许。在前几次汇报时，里根表面上开朗友好，但最终还是难以接近。当里根挥手让特纳说下去时，那样子既轻松而又随和，似乎用一段好莱坞故事，一句保守派的陈言，或是一笑便可打发掉世界性的问题。这与特纳同卡特在一起时忍受的严肃、近于无情的盘问真是天壤之别。与里根接触越多，特纳就越是怀疑里根的基本思维能力。他私下已用“愚蠢”一词来形容里根了。

特纳不得不考虑的最后一件事是他的前途。他想让里根了解他的意愿，甚至是渴望，想保留他的职务。里根以及共和党的政纲抨击卡特束缚了中央情报局的手脚，使它实际上已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间谍活动。共和党人认为，作为局

长的特纳，过份迎合卡特的人权运动，说他醉心于最新的卫星以及电子监听技术，因为采用这类技术清白、被动、相对安全，但他失去了一些良机。在提到中央情报局时用上了“虚弱”这个字眼。但特纳认为，如果当选总统听听他的话，他就能对此进行批驳。他领导的中央情报局的某些活动会使里根目瞪口呆。

特纳曾对他的最高级助手们说：“里根不希望情报局沾上政治色彩，他愿意看到我们保持正确轨道。”局长的话想表明自己位子还没坐到头，助手们对此不由得暗自好笑。他在海军时的老朋友，中央情报局公共事务负责人，退役海军上校赫布·希图认为特纳需要进行面对现实的治疗。

希图告诉特纳：“他们决不会留用你，决不会的！在竞选中他们都把你轰烂了。”

特纳一直很乐观，当然有时这也很不容易。就在大选前，在弗吉尼亚乡间的皮尔里营，特纳召集15位高级助手举办了一个管理讨论班。称为“农场”的这个地方，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训练机构。他曾半开玩笑地搞了一次秘密投票，用草棒当选票，当结果出现在黑板上时，特纳头上好像浇了一桶凉水：卡特2票，里根13票。这恰恰反映了里根在选举团投票时大胜的结果：489对44票。

大选后的第二天早上特别令特纳难堪。那天，兰利中央情报局总部走廊上的欢庆气氛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中央情报局的人还没有从窗口探出头去欢呼，但许多人就像巴黎庆祝解放日一样对待里根的胜利。

特纳洗完澡穿好衣服坐下来看几分钟材料。他翻开《基督教科学》每周选段。如果此时他不坐下，白天就不会有机会了。他总爱想他的教派是基督教的理性的分支，思想和精神都高于其他教派。

那段选段是：“……热情地告诉你的病人，他必须醒悟，不要去注视感官所受的虚假的表象……”特纳承认，对他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情报机构的首脑来说，这一段话有点怪诞，但他目睹了这些教诲的力量。他的外祖父在20年代因在股票市场破产而自杀，而他们的母亲挺过来了。后来他唯一的兄弟因车祸丧生。面对无法解释的悲剧与痛苦，特纳醉心于宗教。他用红笔划出“磨难是主的关怀的明证。”这句话。

没有时间了，他站起身，心想他不重视这段教诲。特纳长得很结实，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半。他直冲下楼去吃早饭，助手们叫做“冲撞速度”。他走路时总带起一阵微风，浓密的白发也飘动了。浅蓝色的眼睛，富有表情的微笑，扶轮社成员的风度，一点也不像中央情报局的人。

在早餐桌上，他喝加柠檬的热水和果汁。基督教科学禁食刺激性的食物，不要酒，不要咖啡。特纳甚至连加咖啡冰淇淋的味道也不喜欢。

桌上摆着《华盛顿邮报》：“据报道，凯西跻身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考虑人选之列。”特纳一把抓过报纸，他还从未听到过有关这种可能性的任何消息。凯西是指威廉·凯西，现年67岁，里根竞选班子的主席。特纳认为选择凯西是一种

倒退，绝对错误。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曾任命他的竞选总管约翰·N·米切尔为司法部长，难道中央情报局也将成为今年政治战争的赐物吗？

特纳读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凯西曾为战略情报局工作，战略情报局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特纳想这全不相干，这就如同找一个二次大战中的老海军将领来领导今日的舰队一样。对于特纳来说，战略情报局只是一些情报老手组成的一张网。战略情报局的一些遗老遗少以及昔日作风至今仍在中央情报局占有一席之地，并已成为令特纳深感头痛的麻烦。这些人都是特工人员，是局中之局，已结成一个帮派。每当中央情报局与白宫或国会产生磨擦时，这帮人总会遭到谴责，就象70年代中期对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时那样，可是这帮老间谍们仍然留在中央情报局，因为还需要他们。每一位总统，每一任局长都需要这些富于献身精神又守口如瓶的特工人员，那些“脏活”总是由他们去干。他们虽不聚会，但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俱乐部。他们在秘密使命中同心协力。这些人能在连获奖也是秘密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这帮人既是中央情报局的实力，又是中央情报局的弱点所在。凯西就是一个冒出来的小兄弟，《华盛顿邮报》说，在二次大战最后的六个月里，他负责向德军战线后方空投间谍。那已经是35年前的往事了。

特纳原想他们会给他一种礼遇，即他被接替的消息透露给新闻界之前先通知他本人。当然这则报道可能只是个试探气球，也可能纯属谣传。在总统竞选开始前，他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凯西其人。两星期前，里根作为当选总统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时，曾宣布凯西将重操私人律师业。

被解职的前景使特纳更加确信，是他领导中央情报局走出了70年代中期那黑暗动荡时期，那是越战和水门事件留下的动乱。国会的调查深掘到中央情报局过去的许多秘密：密谋刺杀外国领导人，试验致幻剂而服用者却一无所知，贮存少量总统禁止的毒剂，偷拆邮件，监视反越战的美国人……是特纳带领中央情报局脱离了牛仔时代，摒弃了他认为是被扭曲了的过分的秘密活动传统。他让人们看到，即使中央情报局必须向国会情报委员会严格汇报他们的行动，甚至最最敏感的行动，他们仍然能卓有成效地工作。他领导的中央情报局从事的活动得到了国会的支持，特纳相信，只要能被理解，这些活动也能得到里根和美国人民的支持。

大选前一个月，特纳避开日常工作，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家里写了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过去四年他的领导工作及今后四年的计划。这份七页的报告标注的日期是1980年10月17日，盖有“中央情报局局长亲启”的印章。这可是最高机密了。这份“目标——交接备忘录”的内容会让当选总统及他的一班人大吃一惊。不错，特纳控制那些牛仔与弟兄帮们的冲动可不容易，可他最终还是掌握了控制权。许多老手现在不在了。但随后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中央情报局被折腾得神经紧张。局里的谍报部门——行动处常常表现出抗命和胆怯，这个

机构秘密的全权负责中央情报局国外工作站和间谍活动，当总统授权对外国事务进行秘密干涉时，由他们承担隐秘活动。

有好几次，特纳提议采取新的隐秘行动都被行动处抵制了。比如有一次，特纳未与白宫商量，自作主张送了一份试探性的备忘录给主管行动处的副局长提出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赶走有碍美国利益的三位领导人——古巴的费德尔·卡斯特罗，伊朗的阿亚图拉·卢霍拉·霍梅尼，以及利比亚的穆阿马尔·卡扎菲，而这位副局长的回答是：对不起，没有办法。三个国家都不存在有生命力的反对派，中央情报局也没有足够的材料去决定支持某一个运动，某一个政党或是某一个反对派领袖。特纳所寻求的只是向这些国家内部的某个人或组织提供隐秘经费或支持的某种办法。1976年，福特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进行暗杀活动。卡特重申了这一点，特纳完全赞同这一禁令，但即便如此，行动处的人还是害怕特纳会把他们拉上一条危险的道路。特纳对他们的反抗程度感到吃惊，不管他如何打听，主管行动处的副局长始终未回答。严重干涉别国事务的情景总让他们感到不舒服，尽管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诚然，他们正向伊朗境外的反霍梅尼力量提供经费，不过目的只是在发生反革命的情况下惩罚一下霍梅尼，或者说是建立某些联系，至少白宫是这么认为的。

特纳还曾向行动处提出由中央情报局制订一次有限隐秘活动计划，在危地马拉寻找和支持一股中间派政客，甚至可以雇用有潜力的危地马拉人。危地马拉政治暴力猖獗。一方是右派军人政府，一方是马克思主义左派游击队，这是中美洲典型的对抗格局。那一年死了数百人。特纳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对中间力量给予隐秘政治支持对美国有好处。

行动处的反映就好像特纳打算邀请克格勃出席上午9点的高级官员会议似的。隐秘行动人员争辩说这样的行动有很大的危险，会使中央情报局超越政府的政策，因为政府政策根本不清楚。假如选中的人不起作用怎么办？假如他反而成了弗兰肯斯坦的恶魔怎么办？假如中央情报局把他树起来了而卡特或另一位总统却打算往另一方向走怎么办？太容易出差错了。一致的反对声使特纳在白宫提也没敢提这个建议。几乎可以肯定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会支持某些隐秘计划，但卡特很可能会跳摇摆不定的华尔兹。卡特总统任期内的一个事实是，他在布热津斯基对世界的“强硬”观点和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对世界的温和观点之间左顾右盼。有一次特纳私下称卡特为“和平主义者”。

前些日子，在11月14日，特纳又把自己另外的观点和想法写入另一份备忘录。在以“白宫”为标题的那一部分里，他写到了“产生冲突的根源”，列举了很多事情，其中许多与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有关。布热津斯基好像把中央情报局看成是为他服务的机构。在一个有关军备控制的情报问题上，特纳固执己见，布热津斯基对他说：“你不是最高法院，你也不是政府的第四部门，你必须搞清你在为谁工作。”

布热津斯基喜欢原始情报材料。国家安全局通过侦听国外通讯，向布热津斯基提供外国首脑谈话的文本，或是某些破译的政治分析报告，这些报告是由某些外国驻华盛顿使馆发往它们本国首都的。布热津斯基往往会问：“你看到了那些侦听材料了吗？”特纳觉得布热津斯基以为单靠孤立的电报或侦听材料就能对重大事件做出解释，这恰恰是犯了典型的低级分析人员的错误。国家安全局侦听到的是吹牛的人或得到错误情报而又妄自尊大的官员、或一位大使的报告。这种报告的材料超出他了解的情报。这类情况太常见了。特纳在“国家安全局”为标题那一部分中写道：“依靠单一情报来源进行分析是危险的。”

特纳和布热津斯基之间的矛盾不断发生，布热津斯基有时咄咄逼人。一次在会见特纳的高级助手们时，布热津斯基曾指责说：“你们在苏联一个人也没发展起来。”实际上特纳已发展了几个苏联人，尽管他能肯定只有一个人是可靠的，有两人已失去了联系，可能被杀，这一点特纳无法肯定。

从前特纳每周要向总统汇报三次，从1977年开始被减为一次，继而又减为两周一次。特纳把这归咎于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央情报局的分析能力还不如他原先那些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

1979年10月伊朗国王来美国治病。那是美国人质在德黑兰被扣的前两周。白宫希望在这位下台国王的病房里安装窃听器，以探知这位反复无常，眼下癌症缠身的人想干什么。特纳提出，国王在美国享有与公民同样的权利，而且根据法律，中央情报局无权在美国国内搜集情报。但他收到了书面命令，尽管觉得不妥，但也只好强咽下这口气，下令对纽约市立医院十七层楼国王的三间私人病房进行电子监听。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把情报部门完全看成是一种工具，就像抽水马桶。一旦出了故障，或是没及时放置窃听装置获得情报，或是中央情报局没能预测未来，都少不了一顿训斥。特纳意识到他不论在中央情报局内还是在他为之服务的总统那边都很孤立，只不过这种感觉有时朦胧有时强烈罢了。

为了与当选总统建立联系，特纳将第二份备忘录的副本交给了过渡班子中的一位官员。此人是为新政府监管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当备忘录退回来时，上面用铅笔写了意见，要求中央情报局立即转变成反苏分析和隐秘行动的左膀右臂。在特纳列举中央情报局某些特性的地方，他看到有潦草的评语，“太自由，害怕政治论争。”而在特纳阐述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的地方，里根班子的这位成员批注道，“必须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左翼份子。”特纳在备忘录中曾提到中央情报局已不能“承受另一次丑闻”，旁边的评语是“气候变了，还会有更大变化，如果担惊受怕地去行动，必无所成。”在特纳提及的中央情报局中最活跃的，最具有干涉意味的准军事能力的地方，字迹潦草的批语写道：“必须重建。”特纳看后心想：好吧，但愿成功。

特纳吃完早饭，他的司机恩尼斯·布朗把车开到门口，送他进市区向里根

汇报。特纳钻进后座，那里有一只公文夹，放着昨晚和今晨送来的文件。政府配备的黑色欧兹莫比尔轿车沿着斯基普威思路向南转上 123 号公路，汇入早晨的车流。布朗娴熟地驾驶汽车左拐右弯，绕过较慢的车子，不失时机地加速，不放过每一个超车的机会。唯一的安全警卫持枪坐在前座，他是轮班保卫海军上将的四个警卫之一。他双眼扫视四周，搜寻着异常情况。这是一个美丽晴朗的秋天早晨，遗憾的是防弹窗遮住了人们的视野，车里的人无法欣赏外边的美景。这辆轿车装有全套安全设施，有防弹钢板，还有防地雷的底板。

后座上的特纳坐立不安，不时移动身子，他心里盘算着想集中力量于那些积极的、最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而又能体现勇气的任务上。像里根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在联邦政府里担任过专职工作的情报工作的外行，很可能对有关情况一无所知。到下个个月特纳还有几次汇报的机会，弄得好可能帮助他保住目前的职务。

“特别海军控制计划”，一艇称为“特海”，是最机密的行动之一。在这些行动中，美国潜艇对苏联潜艇进行跟踪，并在苏联沿海海域执行有高度危险的侦察和情报搜集任务，有时还进入苏联领海或深入港口活动。其活动包括放置一种叫做“豆荚”的尖端电子记录装置，以窃听苏联关键海底电缆网中的通讯线路。这也许算是最为敏感的活动了。潜艇、船员以及派在上面工作的国家安全局的人员却随时处于危险之中。海军喜欢男子汉气的大胆业绩，他们以此而自豪。每次行动都必须由总统批准。一艘核潜艇出海，放置“豆荚”然后撤离那片水域，几星期后再回来从安装在电缆上的纪录装置中取回磁带。磁带必须带回交给国家安全局。由此获取的情报只发给中央情报局、国防部以及白宫的少数几个人。特纳有时认为这样的获得情报与其危险相比仅有边际价值。

不过他也承认，有时潜艇会带回丰富的苏联军事数据，在苏联境外获得大量高质量的过硬情报的行动不多，这种行动是其中之一。“获取物”中包括苏联官员相互之间的交谈内容，透露出他们的不坚定，谎言和虚弱。像许多成功的情报活动一样，这种机会是建立在对方的过失上。苏联人以为他们的海底电缆不可能被窃听，所以通讯内容用的是低级密码，有时甚至根本不用。

另一项计划是“印迪戈”卫星。这是一种极为机密的研制中的卫星系统。它是核查未来与苏联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的关键手段。在天空布满云层时或在夜晚，摄影卫星无法工作了，使用雷达成象的“蓝色”卫星却仍然有效，这一点在东欧上空特别重要，因为那里往往连续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被所谓“魔鬼云盖”遮掩着。

最成功的情报搜集活动有些是由特别搜集小组在国外进行的。这些由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中的精明干练的谍报人员组成的小组，使用最新的装备在外国首都进行窃听活动。他们能一字不差地发回欧洲、中东、亚洲等外国政府高级会议的内容记录，或者是那些身居要位的政治家之间的电话交谈内容。

这些小组能创造谍报工作的奇迹，它们的活动是对那些在美国大使馆掩护下进行间谍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工作的补充。

在那份“中央情报局局长亲启”的备忘录中，特纳写道：“需要更多的关于盟国和朋友方面的情报。”他认为针对朋友搞间谍活动可不是件愉快的事，但却至关重要。比如伊朗国王曾是美国和中央情报局的好朋友，他的情报机关可怕的沙瓦克（SAVAK）一度是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主要供应线。特纳认识到这是多么大的错误，他和他的中央情报局原来一直把霍梅尼错看成是个宽厚而衰老的宗教人士，可现在他扣押了美国人质。特纳的结论是：没有人会像朋友那样使人吃惊，不友好国家要好办得多，因为中央情报局知道去预测要发生的事。

受到伊朗革命震惊以后，特纳一直试图扩大打入外国政府或情报机构包括某些盟国和朋友内的拿薪谍报网，埃及就是一例。中央情报局在埃及的保安行动是对萨达特总统进行保护，提供关于改变或暗杀的警告；同时，也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获取埃及政府、埃及社会，及其领导人的电子和人工情报的机会。萨达特吸毒并患有焦虑症，特纳对这一宫廷流言从未予以注意。不过以后不论萨达特或是埃及发生什么事，都不会令中央情报局感到意外，因为这里已安插了内线。

特纳从情报中了解到沙特阿拉伯的王储法赫德很能喝酒，违背了伊斯兰教的严格禁令；特纳还收到有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的绝密报告，这对白宫很有用，特别是在美苏会谈前夕，军备控制方面的情报支持也很有成效，国家安全局能破译有关苏联导弹试验的一些电报。但是关于苏联最高权力机构苏共政治局动向方面的政治情报尚嫌薄弱，甚至是个空白。而这方面的情报正是卡特和布热津斯基十分需要的，特纳对此却无可奈何。

特纳在中央情报局的任职期间，从未遇到过一件他认为值得用情报人员的生命去冒险换取的情报。但尽管如此，他仍力求搜集更多的情报，这是他的工作。四年当中他仅否决了一次在海外进行极为敏感的情报搜集行动的提议，那是重复前一次成功的行动，特纳认为同样的行动再干第二次太危险。

在以后的两个月中，特纳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现实情况和更多的情况介绍给新总统，里根必须了解整个情报行动的布局，了解各类行动之间的配合，以及这些行动的局限性。

在一次代号“颈病”（这个代号是临时想到的）的行动中，要把一个复杂的电子装置放到东欧一个苏联空军基地外的一棵树上。这个装置必须伪装得像树枝，外面还包上真树皮。它的用途是收集有关先进的苏制米格雷达的数据。与基地相邻的是一个公园，时常有游人去那儿野餐。特工人员星期天只要翻过一道围墙，爬上树放下装置就万事大吉了。但是唯一可派去执行这项任务的特工不是欧洲人，让他混在野餐者当中太显眼，太危险，因此“颈病”行动

推迟了。

这件事说明，情报活动变化无常，大量事情要做周密的安排。有关苏联雷达的情报甚至也许比某些政治局的信息更为重要，但中央情报局不可能监视全世界所有的角落。

特纳的欧兹莫比尔轿车驶近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向南转入单行道杰克逊路，在716号门前停下来，这是里根住的、属政府所有的一幢砖房。特纳下车急步跑上六级台阶。

里根的临时寓所是一幢已有133年历史的四层楼房，正面宽22英尺，说不上是什么式样的。六年前，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领导一个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令人生疑的国内活动进行调查时，总部就设在这幢戒备森严的建筑里。里根是该委员会八个成员之一，尽管他不很积极，委员会开了26次会，而他只出席了10次。最终报告发表时，里根还为中央情报局辩护说：“在任何一个拥有大约1.6万人的官僚机构中，总会有一些人犯错误，做不该做的事。”

特纳进屋不久，里根便走下楼来热情地欢迎他。当选总统看上去无忧无虑，有的仅是不加做作的和蔼礼貌。和他一起的还有新当选的副总统乔治·布什，他是特纳的前任。旁边站着里根的高级助手，埃德温·米斯三世，一位和蔼的律师。在场的还有三个助手。另外就是比尔·凯西了。

特纳向他们介绍了欧洲军事均势以及中美洲的情况，汇报了波兰的最新动态，苏联威胁要入侵波兰粉碎独立团结工会。高空卫星侦察照片，以及在像柏林（这里被称为世界情报活动之都）这样一些地方获及的电子通信侦听材料，都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还有人工情报，特纳又加以补充。

凯西竖起了脑袋。

特纳本想说出来，但是没说出来：在波兰总参谋部，中央情报局有一个钻得很深的间谍，是位上校。他不断从华沙提供有关波兰人和苏联人的意向的情报。上校极为敏感的情报，只能在“BIGOT”名单上列出的，而且必须了解这些情况的最高级美国官员之间传阅。报告是放在一个有醒目的蓝边或宽蓝条的文件夹中亲手交给每个官员的，这种标记意味着极为敏感的人工情报。白宫中只有卡特、沃尔特·F·蒙代尔副总统和布热津斯基的名字被列在“BIGOT”表上，有“蓝条”阅读权。上校的名字库克林斯基从未出现在报告中，只有中央情报局的极少数人知道。

特纳逐个介绍世界各处热点，眼睛不时瞟一下凯西。凯西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凯西讲起话来含糊不清，声音时重时轻就像短波广播。凯西的秃顶四周长着几络稀残的灰白卷发，乱七八精地翘着，使他看上去更象一位心不在焉



的教授。他耳朵很大，甚至牵拉着。两条深深的皱纹从扁平鼻子向下伸展，经过嘴巴的两侧，直到下巴，消失在突出的下颚低下。他看上去衣冠不整。但即使这样，特纳依然感到凯西在注意地听着。

后来凯西走过来过于友好地向特纳表示了他个人的欢迎，但特纳觉得他是真诚的。他看上去背微驼，他的手臂高高举起，一只大手抓住了特纳的手。

“你好，斯坦！”凯西大声打着招呼，满脸堆笑，他将特纳拉到一旁说：“传说我要接你的职位，那不是真的，什么都还没决定。”这可算不上完全否认。也许是在试探特纳的反应，凯西又说：“我没有谋求你的位子。”

特纳离开时，对自已和中央情报局的前途都捉摸不定，有他去职的迹象，但又不那么肯定。

就在同一天，米斯通过卡特的白宫转给特纳的一封信。米斯在信中表明当天凯西的出现并不是他安排的，可他的信也给人一种印象：任命凯西并不是不可能的。人们把米斯看成是当选总统的代表，在新政府里关键的高级官员任命事务上，一般认为他是权威性的代言人。

虽然凯西并没有谋求当中央情报局局长，但他想特纳未必会相信他。其实，凯西想的是国务卿或国防部长。国务院和国防部是重要部门，它们将是里根新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工具，这一推想是顺理成章的。不过，凯西明白他可能不得不降低目标，否则他会一无所获。他不属于当选总统的加利福尼亚亲信。很显然，那些加利福尼亚人会占优势的。他参加里根竞选班子比较迟，最终当上了竞选班子总管，至少理论上是算得上深受重用了，但这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他还算不上是里根多年的忠心耿耿的追随者。

前一年，即1979年早些时候，凯西出乎意料地接到总统候选人里根的一个电话，恳请帮助。凯西多年来一直是坚定的共和党人。他在纽约花园大道200号有一个事务所，为有钱人处理法律事务。凯西进行过一系列极富投机性的投资，在股票市场上他有好运和很好的直觉，加上他还撰写和编辑过二十多本关于税收、投资和法律方面的书籍，使他成了百万富翁。金钱使他有时间从事他最喜欢的政治游戏。凯西在各种竞选活动中担任过一般工作人员、组织者和发言稿撰写人。从1940年起，他一直是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他担任过联邦政府的一些高级职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于1973年至1974年间任政券与汇兑委员会主席。

在电话中凯西告诉里根说：“我现在参加还为时过早。”他解释说不能把他此时不正式加入看成是不赞成，实际上恰恰相反。

他抓起支票簿，飞快地填好一张一千美元支票作为对候选人里根的捐款。对其他每一个有可能当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他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个人捐款所容许的最大限额。在支票下面他草草签上了名字。“威廉”的第一个字母“W”像是刀砍的一样，那是初级学校教的书法。60年前，凯西曾在纽约昆斯区下层中产阶级居住区艾尔姆韦斯特念过第13和第89公立学校。“凯西”最后一个字母“Y”向下的一笔又直又长，上面的小弯精巧漂亮。凯西的签名似乎充满自信却又不自负。

凯西在第八十九公立学校六年级下学期的成绩报告单上有9次迟到记号，行为评分是“C”。在整个小学期间，这是唯一低于“B”的分数。他的学业成绩评分为“A”，同学们都称他为“火山”，那是1924年的事。以后他的境遇越来越好。他通过充当球僮学会了高尔夫球。现在他属于一个很好的俱乐部。1934年到1935年间，他就读于天主教大学社会学院。那里多数学生是教士、修女或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在凯西成绩单下面有手写的字迹“很好”。但凯西认定社会

工作是女人干的事，于是转入了法学院。而今年凯西捐赠给一个基金会的慈善款已达 21970 美元，相当于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年薪。这个基金会是他于 1958 年创办的。凯西是个拥有不寻常财产的普通人。他希望自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一个富有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实干家，要学会在两条道路上都取得成就，一是通过自己的财富和经营活动，一是通过政府、各种委员会以及其它政治活动经历。他知道自己所获得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是牺牲了他的名声。许多人认为他是不名誉的商人，通过一系列机会主义的投资和许许多多商务钻营成了暴发户，是一个引起争议的人。他在他曾管理过的股票市场中善于玩弄伎俩，看上去他往往对批评意见满不在乎，对打官司也习以为常，但在内心里，凯西渴望被人尊重和理解。尽管他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宗教，自己的共和党立场和大笔的股票，但对各种观念他都能表现出灵活态度。但对人则不然，他对朋友完全忠诚。但凯西在 100 种不同的场合下，会显出 100 张不同的面孔。

里根又给凯西打了电话，1000 美元不能使里根满足。他将去东部，到凯西家乡所在的长岛寻找募捐人。里根希望与凯西会面，凯西同意了。两人在凯西家附近一家汽车旅馆共进早餐。凯西家是一处很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庄园，叫作梅诺尔。

他们俩无拘无束地谈了一个半小时，讨论了共和党大选前景。凯西曾听人说里根学识浅薄，而此时他发现里根对经济和国家安全有充分的了解。他虽不作探究，但直觉很好，而且在自由市场、强大的防务和积极反共方面与凯西看法一致。里根仅比凯西年长两岁，两人有同一代人的观点。他们少年时代都比较穷困。凯西被里根丰富的经历所吸引——里根担任过体育播音员、演员、工会工作者、州长，是保守派有力的发言人。而凯西也同样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当过律师、作家、战略情报局间谍头子，业余历史学家（眼下正在写一本关于战略情报局的书），也担任过政府公职。他们都经历过罗斯福和四次战争。两人都在精彩的故事中得到真正的满足开怀大笑。不过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同样瞧不起吉米·卡特，认为他软弱，优柔寡断，有着病态的过分的焦虑。

不久，凯西应邀去加利福尼亚参加里根竞选行政委员会资金特别工作组，凯西明白这是块骨头，但也加入了。他飞到加州，看了收入帐簿，会见了米斯和里根的密友，身材矮小但十分愉快的迈克尔·迪弗。

没过多久，凯西就开始邀请有钱的共和党朋友们参加募款聚会。他说：“我希望你能进城来和里根夫妇共进午餐。”如果对方犹豫不决，他就会说：“听着，你不想错过机会对不对？这家伙会赢的，他会当总统的。”凯西知道怎样从纽约州共和党人口袋里榨出钱来。凯西不停地打电话，他为里根在 1979 年后期募集到 50 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80 年初，里根的竞选总管约翰·P·西尔斯被解雇，里根请凯西接任。

这可是凯西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从政是凯西的第一爱好。